

# 耶稣会士笔下描绘的清代康乾时期中国社会人口状况

——《中国通典》选译

□ [法] 格鲁贤 (Abbé Grosier) 著  
张 放 译

**译者按：**格鲁贤 (Abbé Grosier, 1743—1823) 是继杜赫德 (Du Halde, 1674—1743) 之后，第二位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汉学家。杜氏于 1735 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 率先全景式地向欧洲人推介有关中国的最新知识；格氏于 1785 年发表的《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既传承了杜赫德作品内容，使之于 50 年后得以内容更新，又有其个人创新：根据一个特殊的目录，他重新组合并提炼了前人的成果，刻意收进了由当时仍停留在北京的最后一批耶稣会士撰写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研究文集》(*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 这样最新到达欧洲的知识。《中国通典》1785 年首版获得极大成功，同一年再版，并被译成英文和意大利文，随后多次单独发行，分别于 1785、1787 和 1818—1820 年间，有过三个独立法文本；1788 年和 1789 年分别在伦敦和莱比锡推出英译本和德译本，英译本又于 1895 年再版。由此，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的《中国通典》可称作法国 18 世纪向欧洲推介中国的姊妹篇，在西方汉学领域产生了日月同辉的影响。在法国，它们不仅为法国汉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广泛的题材、无限的思考和多彩的远景，而且在伏尔泰称之为“难以满足企求了解中国的渴望”的 18 世纪，也可以说它们在催生启蒙精神形成和促使旧制度崩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通典》全书分上、下篇。上篇讲述构成中华帝国十五省、鞑靼地区、岛屿、从属国的地理地貌、主要城市、人口、民族、水陆交通、地方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中医药草药材等。下篇讲述最近到达欧洲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内容涉及中国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武装力量、军队纪律、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

《中国通典》较之《中华帝国全志》突出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想和观点，他依据中国人的材料和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反对与驳斥某些偏激作家恣意鄙夷中国和“中国人的谎言”与不实之词，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起源于埃及人说，称中国医学始于国家建立之时，赞扬中国有数不胜数的医学用书，“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自诩有他们如此古老的医学传统”，“即便中国医学家不是解剖家，也不是哲学家，但他们的脉搏学和草药学足以让欧洲行家吃惊”。格鲁贤可谓西方 18 世纪少有的知华派学者。《中国通典》被译成多国文字，多次再版，被誉为“最重要的耶稣会士科学作品”，足见其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清代康乾时期中国人口状况》选译自《中国通典》上篇卷四第二章(原文 1785 年版，第 268—290 页；1787 年版，第 397—428 页)。作者在驳斥西方对中国人口的最大质疑时语言朴实无华，常常不乏生动和幽默，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华的学者型耶稣会传教士眼光锐利，考察细致入微，方法灵活周到，从宏观和微观方面不仅描绘了清代康乾时期中国人口的组成状况，也提供了中国社会、城市、家庭、文武官员制度、纳税制度、男人女人、军人平民、衙门和外委等诸方面丰富有趣的信息，对认知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特点很有帮助。

中图分类号：K25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7.01.006

欧洲对中国的种种偏见还没有完全被推翻：无论是我们收到的关于这个帝国的“故事和著作”是多么众多，无论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以及德国讲述者的旁证是多么一致，我们还是认为，在这些旅行者关于这个遥远民族向我们所讲述的一切真相之中是混杂着夸张成分的。在欧洲，最可质疑和最矛盾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中国的庞大人口。钱德明 (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神父曾经认为，必须对人们至今只是以一种相当笼统方式对考查的问题进行讨论。从他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在我们写此文章之时，中国有两亿人口。这个庞大的人口数量可能令人吃惊；但是，当我们衡量这位机敏而博学的传教士采用的证据，跟踪他所使用的推理之后，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就不显得夸张了。这次有趣讨论的基础即所引用的事实与统计数字取自于一部中文书，书名为《大清一统志》——“中国要闻须知”。这部著作是根据当时皇帝乾隆指令编撰，于乾隆在位第八年发表，共 24 套，含 100 卷。这部著作是皇家图书馆藏书之一。

《一统志》这部书只是表明了大清帝国各省纳税人的数目；但是，了解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计算出全国人口总数（见表 1）。

省 份	纳税人数量
北直隶，北京城除外	3 340 553
山东	2 431 936
关东或辽东	47 124
江南，分为 2 个省：江苏和安徽	2 917 707 2 435 566
河南	2 527 456
陕西	1 793 895
浙江	3 124 798
山西	2 252 549
甘肃（山西的一部分），包含建长城时定居的汉人家庭	708 258
江西	1 336 270
广东，我们一般称作广州	1 201 320
广西	228 690
湖广，分为湖北和湖南	852 970
云南	237 965
贵州	51 089
四川	3 036 342
这些总数相加，纳税人总数	28 516 488

表 1 乾隆八年，即 1743 年中国各省纳税人状况

必须指出：中国政典所指“纳税人数”，表示的是“家庭”人数，其含义所指只是户主数目。当涉及个体人数时，中国人使用“口”这个量词，比如，他们说这个城市，这个城镇，这个村子有多少口人，等等。一个家庭由十口人组成，也可由五口人，或两口人组成，但是，登记的只是家长的名字，因为人们只是指定家长分担责任。人们不计女人、儿童，也不计仆人，更不计奴隶。中国人认为把每个家庭计作六口人，与准确数字相差无几。况且，长期经验使负责统计大小城市百姓人口的官员们确信这个数字是对中国人口的最准确的估测。但是，我们可以满足于小一点儿的估数，我们假设每个中国家庭只有五口人，将纳税人或家长的数目乘以五，这是户部 (Tribunal des Subsidies) 于 1743 年呈报皇上的状况，我们将会得出构成纳税人家庭人口的总数为 142 582 440 人。

钱德明神父保证说，他肯定没有夸大数目，并坚称这个数目至多只是中国居民实际数量的一半。为了便于判断，有必要了解某些细节并观察下列情况。

对于纳税人人数，根本没有将官员计算在内，而这些官员在像中国这样如此辽阔的国家里，其数量理应，也确实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只是指明主要官员，也就是说，只是指明占有国家级地位的官员，他们属下还有一群下级官员，这些下级官员同他们一样享受免税特权。这些主要官员是各省的总督，其中 11 位享有总督身份，15 位享有巡抚身份。在他们之后是 19 名户部高官；接着是 18 名刑部长官，17 名吏部长官 (Inspecteurs-Juges)，93 名负责监视城市，特别是总督行为的御史，等等。所有这些重要官员属下都有不同职称的官员，作为他们的助手或参谋，帮助他们管理各自属下的事物。户部高官属下设有 23 位官员。刑部长官有 14 位总务助手，18 位助手负责查看监狱和 27 位助手负责司法信息。御史管辖 11 名官员，后者必须向御史汇报他们要查看的公共仓库所处状况。

这些官员负责全面监察帝国各省，在他们之后是一级、二级和三级城市的总督。一级城市总督有 179 名；他们的属下有 204 名同知 (Toung-tche)，176 名通判 (Toung-pan)，220 名经历 (King-ly)，

73名司狱(See-yu)管理监狱和监督囚犯,10名税大使(Choui-ta-che)监督县总海关,12名副税大使(Fou choui-ta-che)监督城市个别海关,5名仓大使(Tsang-ta-che)监督公共粮仓,以及186名教授(Kiao-cheou)监督学校。

二级城市知州有211名;他们属下有64名州同(Tcheou-toung),90名州判(Tcheou-pan),224名吏目(Ly-mou),4名库大使(Kou-ta-che)监管公共仓库,4名司大使(Choui-ta-che)监管海关,4名直隶厅(Tche-li-ting)和217名学正(Hio-tcheng)监管学校。

三级城市知县有1290名;他们属下418名县丞(Hien-tcheng),1100名教谕(Kiao-yu),1520名训导(Hiun-tao),108名主簿(Tchou-pou)(最后三级官员只与学校和文人有关),960名巡检(Hiun-kien)负责监管村庄,1297名典史(Tien-che),7名税大使监管全城的海关,8名仓大使监管公共谷仓,55名驿丞(Y-tcheng)监管邮政,以及44名闸官(Tcha-koan)监管船闸。

如果加上上述这些不同的数字,人们将会发现,皇帝为管理其帝国各省事务,官员的总数上升到8965名。但是,还有大量由高官任命的下级官员。虽然政治历书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官员人数,但是,必须把他们计算在内,还有他们属下管理的其他下级官员,因为在列举的纳税人数目中,这两部分人没有包括在内。即便他们的数量比其上级官员数量大十倍,这个数量也要少于实际数量。因此,必须将89650加到前边的8965之上,这样就会得出分布于帝国各省的上级和下级官员的总数为98615。但是,所有这些个人应被看作是同样数量的家长书目。因为我们估计构成一个家庭为五口人,其结果是493075,还要将此数加到我们已经确定的142582440之上,我们就会得出143075515。

在中国,文人构成其民族的最精华部分。自汉朝以来,也就是说,自大约两千年以来,他们一直占据帝国的第一等级;总是在他们之中选拔教育专家,掌管国家事务和政府的大臣,裁判民众的法官。总之,在某种意义上说,文人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因为只有从他们那里,中华民族获取了其伦理道德的存在及其一切政治和世俗的本质。因此,文人在这样的国家里必然数量众多,

因为他们尽享养尊处优的一切荣誉,一切都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而且竞相增加其数量。事实证明,这种后果的合理性。因为在中国,文科是获取荣誉的唯一道路,举凡追求仕途发展者都必须攻读文科,还必须证明他们成功掌握了文科,如此才能取得公共职位。每个一级、二级和三级城市的政府为了确保人力资源,都要确定每年必须晋升到一级文科,亦即“秀才”,相当于我们大学里的结业生的文人数量。凡是秀才都被看作是贵族,不被登录为纳税人。当人们估计中国的总人口数量时,必须大致了解这些人的数量。单就每年必须提供其固定晋升人数的各个城市的名字,就可以填满许多页纸,甚至一本完整的小册子。每年四次,北京印制的政治历书里记载着这个完整的名单。我们只把同一个省的各个城市提供的不同数量的秀才加在一起,而后将总数置于该省名下(见表2)。

省名	秀才数量
北直隶	2496
江苏	1410
安徽	1285
江西	1356
浙江	1877
福建	1166
湖北	1102
湖南	1184
山东	1867
山西	1559
陕西	1127
甘肃	935
四川	1446
广东	1343
广西	973
云南	1199
贵州	704
总数	24701

表2 各省秀才数量

如此看来,中国每年有24701人被引进文人生涯;这就可以料想到通常竞争这一生涯的人数至少要大二十倍。根据这种计算,中国经常有494020名文人获得了官级,因此,他们不被计算在纳税人行列。这些文人都是家长,如果我们根据中国人的计算方法,每个家庭由五口人组成,

将查到的文人数量乘以五倍，我们就会得出人口的数目是 2 470 100 人。这些人口数加上我们已经得出的 143 075 515，便会得出总数 145 545 615。

在文人之后，就是打仗的军人，他们也享受免税特权，因此也不在纳税人之列。钱德明神父因为人们理应猜到的政治原因没敢咨询负责记录帝国军队状况的部门，因为一个外国人就如此敏感问题进行研究，很可能引起胆小怕事的中国人的恐惧。但是，以文人人口计算的方法，就可以得出一个约数，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以下细节摘自北京每年印制四次的军事历书。在这个军事历书里可以查到中国军队的人名、职称、驻扎地点，以及全部军官的数量。了解了这个数目，便可得出士兵的数目。

省级部队统领称作提督，共有 19 名。

提督下辖的其他官员统领每省各个城市的部队，以不同官职名相区别：

总兵 65 名

副将 118 名

参将 163 名

游击 374 名

守尉 828 名

都司 420 名

千总 1 617 名

把总 3 457 名

总计 7 061 名

除了定居在一级、二级、三级城市的官员以外，还有在被称之为“卫城”（Ouei），即筑有围墙，但并不设防的城市官员。居住在这些不同城市的官员情况如下：

守尉 50 名

千总 250 名

门守尉 50 名

总计 350 名

加上所有这些数量，可以得出由皇帝任命统领中国部队的军官总数为 7 411。

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军官中每位官员除了他直接属下的士兵之外，还维持着一大群人构成他们称之为的“衙门”，或办公所；在每个“衙门”

里，都有“低级官员”传达和执行指令，负责登录一切事宜的文书和录事，以及时刻准备着听从需要的服务人员。这些人的数量与构成“办公所”官员的数量相比，至少是 10 : 1 之比。我们把军官数量乘以 10，便得出 74 110 的数目。

还必须看到，在军事历书里没有提到在中国称之为“校尉”的下级军官，他们相当于我们的“代理长官”，因为外委不全是由皇帝任命的，他们的数量不固定。提督有权将表现突出，或有卓越事迹，或恪守尽职的士兵提升至一等军级。我们不了解这些军官的数量，我们只知道构成城市驻军士兵的数量，或在帝国全境为确保旅行者安全，也为了当形势必要之时以点燃烽火办法发出信号，在各条重要通道上按一定距离布置的士兵数量，我们将他们整体计算在内，根据我们总是低估的方法，以士兵与军官 100 : 1 计算，可以得出估计数为 741 100，加到前述的数量之上，可得出军官、士兵和其他属于中国军队的总数为 822 621<sup>①</sup>。

中国的军人，像构成中华民族的其他个人一样，都是家长；因此，将他们的数量乘以五，可以得出人口总数，他们享有军队特权，不包括在列举的纳税人之列，这个总数为 4 113 105。

我们把此数与已经得出的人口数 145 545 615 加在一起，可以得出 149 658 720。

钱德明神父在这里指出，还应该有五千万人补加到二亿以上，中国的居民总数多于我指定的数量。《关于埃及人与中国人之哲学研究》篇目原文括注的作者 M. 鲍（M. Paw）兴许乐意帮助我们弄清中国的人口数量，“要在侵扰帝国重要通道至广州周边的盗贼中寻找，要在为数众多的穴居人中寻找，要在受利好吸引逃离内地而去商业城市周边生活的漂泊家庭中寻找，要在这行乞和尚、被阉割者和奴隶中寻找”，我们还可以加上所有盲人和尼姑，他们经常与贫穷和放纵以致卖淫的可耻行为的受害者们混淆起来。如果这些人还不够的话，我给他们加上海关上的数目庞大的群体；特别是这些流动城市居民，在船上或木筏上生活的居民似乎构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一个特殊种

① 我们发现，一个中国文人对钱德明神父的这种计算大不以为然，信誓旦旦地指出：这里的总数不是 822 621，至少也应是 2 000 000。

族。至此，在我所说的一切当中，还没有提到北京城居民，他们肯定有二百多万人，也没有提到在汉人中生活，并控制和管理他们的满族人，也没有提到手工业者，也没有提到丝织工人，他们的数量不仅与他们为之工作的各自地方人口相匹配，而且也与每年为他们的船只装卸其劳动成果的外籍人口相匹配；也没有计算充斥帝国城镇的小零售商人；最终也没有将此构成民族大群体的小老百姓人口计算在内，这些人口数量与各地一样，甚至多于别处。

我们发现，在钱德明神父的计算中存在一个巨大缺口，在他指明帝国各个省份现有纳税人数目时，绝口不谈福建省。这个奇怪的缺失不是有意的，也不是经过思考的：它只不过是遗忘或粗心造成。1743年，我们刚刚阐明各个方面计数人口的时期，福建省的纳税人数目上升到1 528 607。将家长数目乘以五倍，可以得出福建省人口数量为7 643 035。

将此数目加到已经得出的人口总数量149 658 720，可以得出新的人口总数量为157 301 755。

这个人口状况是《一统志》印制的1743年人口数量。但是，此后这个人口数量肯定有了大大增长，因为人们发现中国人口继续有了明显增长；这也是经《一统志》一书证实的，它比较了两次统计的结果，书中说：“在最近一次实现的统计中，每个省份的纳税人数量是多少，纳税人数量增加了多少。”本来人们期望最新的人口统计年份应该指明，因为这个年份没有指明，而且我们知道以前的习惯是每年向皇帝报告帝国的人口状况，我们可以假设这份最新的人口统计发生在乾隆在位的第七年，也就是1743年。为了把估测总是限制于最低值，我们把这最近一次的人口统计，追溯到尽可能远的时间，假设它是在乾隆在位元年完成的，也就是说，是在1736年；然后，根据《一统志》的比较状况，我们可以看到1736年的人口状况，以及1743年人口数量的增加状况。（见表3）

1736年纳税人状况	1743年纳税人增加数量
北直隶：3 292 645	47 910
山东：2 278 982	152 954
江苏：2 821 146	96 561

（续上表）

1736年纳税人状况	1743年纳税人增加数量
安徽：1 407 285	28 281
河南：2 289 875	237 581
陕西：1 758 635	35 259
浙江：2 937 899	186 899
山西：2 149 890	4 469
甘肃：304 249	7 723
江西：1 308 724	19 775
湖南：368 008	7 774
湖北：454 417	22 771
福建：1 468 615	59 992
广东：1 179 630	21 690
广西：205 995	14 695
云南：185 865	52 100
贵州：37 536	13 553

表3 1743年较之1736年人口增加情况

这种人口增长在四川省更为明显。该省以前登录纳贡税的家庭只有144 154户，而当今家庭数量为3 360 342户。这个巨大的增加数量可能来自鞑靼人入侵时退守到该省山区定居的为数众多的家庭。在山西和甘肃省的增加数量也一样，在同一时期，许多家庭躲避起来了。这些增加的数量在多年内难以保持着一种准确的计算，给征收贡税造成了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加上由于众多免税人、穷苦人、流动工人以及河上人口等等产生的困难最终促使雍正皇帝废除了人丁(Jin-ting)，取而代之以地丁(Ty-ting)，就是说，把贡税改变成切实的人头税，以使国家收入来源少一些花样，以更准确的方式征收，给百姓少一些负担。

我们从钱德明神父的计算得出中国人口是157 301 755；但是，他后来对其余估算的数据，在读者心里可能会对把中国人口提升到二亿存有质疑。为了证实“机敏传教士”的说法，并使之免除被夸张的疑虑，我们提供乾隆在位第二十六年，亦即1761年进行的更完整、更新的统计结果。这个中国人口统计表因为直接摘自《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Tribunal des Fermes de l'Empire)，真实可靠，法国于1779年收到此文件。该文献以汉字书写，但是附有汉字说明，说明文字在北京当地已经译成法语。下面是原始文献的复件，要自上而下地念，因为汉字是竖排的。也要了解汉字的OUAN，意为“一万”。

<p>1 奉天（即辽东）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六十（60） 六（6） 万（10 000） 八（8） 百（100） 五十（50） 二（2） 668 852</p> <p>2 直隶（或北直隶）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一（1） 千（1 000） 五（5） 百（100） 二十（20） 二（2） 万（10 000） 二千（2 000） 九（9） 百（100） 四十（40） 15 222 940</p> <p>3 江南分为两个省：安徽，江苏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二（2） 千（1 000） 二 百（100） 七十（70） 六（6） 万（10 000） 一（1） 千（1 000） 三十（30） 22 761 030</p>	<p>4 江苏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二（2） 千（1 000） 三（3） 百 100 一（1） 十六（16） 万（10 000） 一（1） 千（1000） 四（4） 百（100） 九（9） 23 161 409</p> <p>5 江西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一（1） 千（1000） 一（1） 百（100） 万（10 000） 六千（6 000） 六百（600） 四十（40） 11 006 640</p> <p>6 浙江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一（1） 千（1 000） 五百（500） 四十（40） 二（2） 万（10 000） 九千（9 000） 六百（600） 九十（90） 15 429 690</p>
--	--

<p>7 福建 省 — — — 共 八（8） 百（100） 六（6） 万（10 000） 三千（3 000） 六百（600） 七十（70） 一（1） 8 063 671</p> <p>8 湖北（湖广分为两省：湖北和湖南）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八百（800） 八（8） 万（10 000） 六百（600） 三（3） 8 080 603</p> <p>9 湖南 省 — — 共 八百（800） 八十（80） 二万（20 000） 九千（9 000） 三百（300） 二十（20） 8 829 320</p> <p>10 山东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二千（2 000）</p>	<p>五百（500） 一十八（18） 万 七百（700） 三十四（34） 25 180 734</p> <p>11 湖南 省 — — 共 一千（1 000） 六百（600） 三十三（33） 万 二千（2 000） 五百（500） 七（7） 16 332 507</p> <p>12 山西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九百（900） 七十（70） 六（6） 万（10 000） 八千（8 000） 一百（100） 八十九（89） 9 768 189</p> <p>13 西安（或陕西）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七百（700） 二十（20） 八万（80 000） 七千（7 000） 四百（400） 四十三（43） 7 287 443</p>
--	---

14 甘肃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七百 (700) 四十一万 (410 000) 二千 (2 000) 一十四 (14) 7 412 014	女 共 三百 (300) 九十四 (94) 万 七千四百 (7 400) 一十四 (14) 3 947 414
15 四川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二百 (200) 七十八万 (780 000) 二千九百 (2 900) 七十六 (76) 2 782 976	18 云南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二百 (200) 七万 (70 000) 八千八百 (8 800) 二 (2) 2 078 802
16 广东 省 —— 共 六百 (600) 七十九万 (790 000) 七千五百 (7 500) 九十七 (97) 6 797 597	19 贵州 省 大 小 男 女 共 三百 (300) 四十万 (400 000) 二千 (2 000) 七百 (700) 二十二 (22) 3 402 722
17 广西 省 大 小 男	乾隆二十六年  我们把所有这些数量加在一起，可得出 1761 年乾隆在位第二十六年中国人口总数为 198 214 553 人。

表 4 乾隆在位第二十六年，即 1761 年中国总人口数统计

这个统计总数伴有乾隆在位第二十五和二十六年，亦即 1725 和 1726 年的比较状况发出。第一年中国人口数量为 196 837 977 人，第二年中国人口数量为 198 214 553 人；相比之下，仅在一年期间，人口增加了 1 376 576 人。但是，自从这次统计以来，已经过去了 20 年，既然事实证明中国的人口长期以来一直在增加，难道不可以从这次统计以后推断出这个帝国当今的人口有两亿多吗？兴许，人们会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君主能够统治这样多的人口，他们汇聚在同一个社会之中，接受同样法律的管理。

但是，人们会说，在亚洲这个遥远的国度，这种源源不断增加的人口从何而来？难道仅是机体的胚原吗？抑或只是由于伦理和政治制度影响下才这样多产吗？可能，但很难就此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可以说，产生如此众多人口的表面理由如下：1. 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一直保持着孝道的美德，而父亲身份的各种特权使儿子成为父亲最富有、最可靠的财产；2. 以死后无后为耻；3. 根据一般的风俗习惯，孩子的婚姻成为父母的最重大事件；4. 政府授予不二婚的寡妇各种荣誉；5. 频繁的收养减轻了家庭的后顾之忧，确保了家庭谱系的延续；6. 女孩丧失继承权，其财产回归本家；7. 妇女的孤独使她们对丈夫更百依百顺，从大量事故中保障她们的妊娠，并且迫使她们悉心照顾她们的孩子；8. 士兵的婚姻；9. 总是与土地有关的赋税不变原则只是间接地落在商人和手工业者身上；10. 海员和旅行者数量少；11. 大多数人只是不时地待在家里；12. 帝国享有长久的和平；13. 简朴而勤劳的生活，甚至大人物亦如此；14. 摒弃虚妄的门当户对成见；15. 看重家庭而非个人的古老政策，高贵身份只授予有职位的天才，而非世袭；16. 稳重的公共道德和无风流丑闻。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